

東方有二白

—— 檢討盧建榮《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》的 「東方白」烏龍事件

◎ 楊 翠

2003年，大河小說《浪淘沙》作者東方白遭到無妄之災，被中研院學者盧建榮誤指為與武俠小說家東方白是「二人合體」。事實上，「東方有二白」，兩位東方白並非同一個人；這起烏龍事件，可以說是「台灣本土論述」被任意定義、組構、支離、切割、變造乃至污名化的具體實例。

2003年8月，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、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盧建榮，標幟著「主要專長：中國文化史和當代台灣文化史」的專業學術身份，在學術出版界的「權威認證」麥田出版社，出版了《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（1950～2000）》一書。該書〈導論〉，要點有二，其一，作者判定：「朝野合謀之下，本土論述大有駸駸然成為主流文化論述」、「台灣本土化運動針對的是去中國性」；其二則是以此「判定」為基礎，對「本土論述」的「去中國性」進行批判，質疑「中國性」與「台灣本土性」何以不能相容。可惜的是，歷史學博士出身的盧建榮，在提出這些結論式話語之前，並未經過學術論證的可檢驗過程。

在其書中，張深切、張文環、鍾肇政、陳鴻森等台灣文學前輩均在被討論與被檢視之列。而東方白的例子，看來應是被盧氏視為得意的經典案例，因為他在短短不到四頁的〈導論〉中，即以8行的篇幅，陳述東方白的案例，用以支持並證明

他的論述。其中有如下文句：

另一個台灣本土和中國性共存共榮的例子發生在東方白身上。……《浪淘沙》本土論述氣息濃烈無比，但大家可知道東方白同時出版多部以中國文化為號召的武俠說部嗎？亦即東方白左手出貨的是台灣本土，右手賣出的是中國性。他這樣左右交加、他的精神不鬧分裂嗎？（盧書，頁017）

盧建榮對於台灣的「國族認同」問題深感興趣，他自言曾於1994、1995年之際，協助文建會在嘉義梅山從事「社區總體營造」，並且「在北、南選五所中學進行七年級生的文化認同調查工作」（盧書，頁015）；關於認同問題，前此已出版《分裂的國族認同（1975～1997）》一書（麥田，1999）。關於東方白的相關論述，盧氏將其置於《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（1950～2000）》一書的上篇〈俗民文學中的中國性與台灣後殖民反思〉中一文，附標題更直接點明「製作中國性」。文中，他將著有《白衣紫電》（全5冊，台北，泰裕，1989）的東方白，與《浪淘沙》作者東方白，理所當然地視為同一人。然而，細讀其文脈，盧氏身為歷史專業學者，其學科訓練中非常重要的證據、「辨明」之論證功夫卻完全未見，吾人完全無法得知盧建榮這位美國博士、中研院史語所研究

員，究竟是根據何種可信的論據資料，「驗明」了兩位東方白的「正身」，從而確認兩個作者的「本尊」實為同一人，再據此「論述」其觀點。書中，關於作者身份之部，僅有如下語句：

東方白於七〇、八〇年代開始投入武俠小說文化工業的生產工作。他於九〇年代憑著發表《浪淘沙》一書，儼然成為台灣國族主義的代言人。這對照他前此透過武俠小說去建構中國傳統，其所形成強烈之對比，足以讓人懷疑「東方白」是不同兩人使用同一筆名呢。（盧書，頁055-056）

本段文字義理至明，盧氏在心理上是已完全確認兩位東方白是同一個人，並由此而提出所謂「強烈之對比」的論斷，至於文末的「讓人懷疑」諸語，不過是用來強化兩種「東方白」「前後判若兩人」之強烈對比的效果，盧氏文中從未懷疑過此「東方白」非彼「東方白」，他的論述亦環繞著此「合體東方白」的內在分裂及其所彰顯的意義而討論。盧氏甚至指出：

繼《浪淘沙》之後，《芋仔蕃薯》亦屬台灣論述的文本，書中特別針對「數典忘祖」和「血濃於水」兩語詞所支持的中國國族論述，加以大力批駁……然而，筆者回溯東方氏在八〇年代武俠文本中竟然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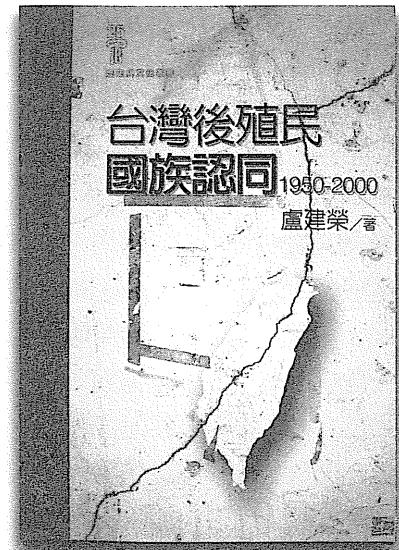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31 盧建榮《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》書影。（許玉潔 摄）

「數典忘祖」和「血濃於水」兩辭大張其目。……這種前後判若兩人的行徑代表著國族認同的翻轉或改易。倘若台灣國族主義者的信眾赫然發現其先行者竟曾有過政治不正確，筆者很好奇想知道的是，這將會是何光景？」（盧書，頁056）

盧建榮頂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的頭銜，在台灣此種「本土學術生產機制」底下的學術產品仍然被邊緣化，必須擁有外國的學術認證才是「專業」的學術生態中，進入國家級最高學術研究機構——中央研究院，成為最具「學術專業」

指標的「研究員」，並且在這幾年文化工業場域中新興的「權威認證」出版社——麥田出版社出版其著作，理應具有「專業」的品質保證。我們都贊同，學術論述並沒有絕對而唯一的「客觀性」，然而，論述過程的論據與論證之提出，應該能夠讓不同意見的人也能接受、容納。遺憾的是，關於「東方白」的身份，盧建榮的書中卻完全未見論據與論證過程，直接就將兩位「東方白」視為一體，並由此導衍出他自覺非常重要的、關於本省作家如何在武俠文本中「製作中國性」、又在九〇年代「翻轉」成為「台灣國族主義教父」（盧氏用語，盧書，頁022）的結論。我們要問的是，如果前提錯誤，盧氏所導出的結論如何是真實的？

事實上，寫《浪淘沙》的「東方白」被誤為寫武俠小說的「東方白」，由來已久，連「中國文藝·武俠文學·武俠作家介紹」的網站上，關於武俠小說家「東方白」的簡介也如此挪用。然而，歷史學者求證辨偽的功夫不足，就可能出大差錯。寫武俠小說的東方白，一來不知是否聽聞此事，二來也不是盧氏主要批判的對象；但寫《浪淘沙》的東方白正是盧建榮要據以批判、並援以為擴大批判「台灣本土論述」、「台灣國族論述」的經典案例；寫《浪淘沙》的東方白必須提出「非我聲明」。2004年春季號的《文學台灣》上，

即刊載了小說家東方白的〈非我聲明〉，該文寫於2003年10月30日，比起盧建榮的嘲諷與批判筆調，被傷害的東方白卻顯得較為溫和與寬容：

人生苦短，等待去做的重要事實在太多了，我不但無意也沒時間去追究如此丁豆小事。反倒因作者「正法未先驗明正身」的一時疏忽，而造成對他自己學術信譽的傷害，感到十分的關心和同情。唯有一事叫我不能釋懷——如果有我20年的讀者讀了此書而盡信其言，誤以為我便是Sterenson《Dr. Jekyll and Hyde》的「雙面人」，那麼就茲事體大了。（東方白，〈非我聲明〉，2004年春季號《文學台灣》，頁16）

的確，東方白在〈非我聲明〉中，並未針對盧氏的錯誤提出任何批判，表現出相當的寬厚，以此戳破了所謂「本土論述排他性」的偏見。然而，這麼嚴重的「疏忽」，除了東方白自己的聲明，以及東方白友人在《台灣日報》副刊的仗義直言之外，學界卻未對此展開相關討論，盧建榮的「疏忽」、以及據此「疏忽」所衍繹出來的「本土論述」圖像，乃至他對「本土論述」的相關批判，都還在書市之中喧嘩不歇。《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》一書以標幟著「多重專業」的身份證明，要讓讀者相信：東方白「左手出貨的是台灣本

土，右手賣出的是中國性」，是一個操弄兩種圖騰符碼的「雙面人」。作者未曾為其嚴重的「疏忽」鄭重道歉，他的「學術信譽」看來也未曾真正受到傷害，書還擺在架子上，等待閱讀，作者及出版社都未曾對文學／文化的消費者負責，未曾回收該書。作者、出版社、學界群體此種沉寂現象，在向來強調對「文化霸權」（包括「台灣本土論述」）必須嚴厲批判的台灣學術界，呈顯出極其弔詭荒謬的圖景。

事實上，「東方白」被「混體」的烏龍事件絕非一個單一事件，它揭開一個嚴重的課題——學術界關於「台灣本土論述」的批判，原來如此不堪一擊。

近幾年來，所謂「台灣本土論述」遭受各種形式的批判，堪稱陷入被「圍剿」的情境，論者一方面指「台灣本土論述」為「主流論述」，一方面卻又通常未曾明確釐清「台灣本土論述」的內容。這些對所謂「台灣本土論述」嚴厲批判的論述，無論從政治、文化、文學的角度切入，歸根結底有幾種有基本論點；「台灣本土論述」已是主流論述、文化霸權，它根本是要「去中國性」，它是狹隘的、自閉的、排他的，也因此推衍到「台灣本土論述者」就是基本教義派、只奉行政治正確、單一價值標準……。「台灣本土論述」被抽離出具體內容，被抽象化、符號化，至於論述者以其預設觀念（但通常並不誠實承

認），再去尋找相關素材，以驗證自己的預設概念的情況，絕非始自盧建榮，盧氏只是比較倒楣，抓到了錯誤的素材。

學術研究本來就是在虛構中建構另一種虛構，沒有絕對的「真實」，然而，「學術」的「客觀性」仍然能夠成立，也正是由於它還有一套足可檢證、批判的論證過程可供依據。然而，台灣學術界近幾年來不斷出現的現象，卻是論述者對一個語詞連操作型定義都懶得下，繼而對此自設的「語詞」所自認的指涉——「一種論述」、「一群人」——大加批判，這在世界學術史上恐怕也是少見吧。

究竟誰是「台灣本土論述」？如何「台灣本土論述」？什麼「台灣本土論述」？為何「台灣本土論述」？為誰「台灣本土論述」？所有這些，通常都未被「界定」，其內容恐怕連「被指為台灣本土論述者」都很茫然。無論是講求語詞定義必須明確的社會科學，抑或講求堅實的論據與論證的歷史學皆然，「台灣本土論述」成為一個「不辨自明」的「全稱語詞」，論述者以自己的「想像」來使用這個語詞，給予這個語詞某些「全稱的」、「想像的」、「本質化」的特性，然後再據以批判它。先將別人「本質化」，再批判別人的「本質化」，如此不符合「學術專業」的論述策略，卻出現在這些有著「多重學術專業」認證的學者手中。這個現象所呈

各大學台灣文學 博、碩士論文評述

◎ 游勝冠

顯的，已經不是個別學者的「一時疏忽」而已，而是包裝在學術專業性外衣底下的成見與偏見；其所反映的，其實正是不同國族主義的惡鬥而已。其中，中國國族主義正是一隻潛伏的巨獸，在批判「台灣國族主義」時，吼然現身，至於現代、後現代、殖民、後殖民、文化研究云云，不過是被挪借的學術外衣罷了。

套用盧建榮《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（1950～2000）》一書中〈自序〉的標題：「台灣有誠意進行殖民主義反省嗎？」；我要問的是：台灣有誠意進行學術建構的反省嗎？國族主義是不可討論，認同問題是不可論辯，但是，動輒在論述中貼別人標籤又要罵別人「霸權」的論述者，是不是願意以真誠、剝棄虛華的學術外衣，尊重被貼標籤、被客體化、被全稱化、被本質化的論述「對象」，進行真正有營養、健康的、雖未必相互接受卻能彼此尊重的討論，而不是佔據「多重專業」認證的學術殿堂，不為自己的論述負責的另類「一條鞭」論述策略？

台灣有誠意進行「學術生產線的權力政治」之反省嗎？我們必須共同來思考這個課題。

2003年台灣博、碩士論文以台灣文學為研究範疇的論文，據國家圖書館的論文目錄所錄，因為存在著某些議題算不算台灣文學的爭議，粗估結果，博士論文共計16篇；碩士論文合計則達130篇。

由這樣的數目來看，或許其數量還是少於龐雜的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；但如果和先前的蕭條相比較，卻可以看到台灣文學的相關研究論文的數量，隨著台灣文學研究風氣的打開以及各公、私立文學或台灣文學研究所的相繼設立而與日俱增。

由於台文系所的成立最長的才不過3年，畢業生的數量有限，真正對台灣文學研究論文數量的提升做出貢獻的，其實不是台灣文學研究所，而是跳脫傳統學門界線，近幾年成立的「文學所」與「兒童文學研究所」，前者有南華大學、佛光大學的文學所；後者則以台東大學的兒童文學研究所為龍頭，師院系統以兒童文學及其教學的研究為主的各研究所。

雖然在量的貢獻度上有限，但在2003年出爐的這批博、碩士論文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國內最早成立的成大台文所，在成立後的第3年，終於也有學生畢業了，由於該所是第一個以台灣文學為專業，並在台灣文學是否足以成為一個獨立學門的爭議中創立的研究所，所以該所碩士畢業生